张华 主编

翰明伯文化学派领军人物述评

山东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翰派物
明学人
伯化军
文领

述评

责任编辑 狄思宇
封面设计 张 荔

ISBN 978-7-5607-3588-7
9 787560 735887 >
定价：18.00元

伯明翰文化学派领军人物述评

张　华　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伯明翰文化学派领军人物述评/张华主编.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6
ISBN 978-7-5607-3588-7

Ⅰ.伯...
Ⅱ.张...
Ⅲ.文学流派—思想评论—英国—现代
Ⅳ.I561.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1407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恒兴实业总公司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8.875 印张　222 千字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目 录

导语：作为文学理论的文化研究 …… (1)
怀旧与批评：霍加特《识字的用途》 …… (5)
文化与大众文化：威廉斯的文化研究 …… (24)
重构与拯救：汤普森的文化研究 …… (44)
斯图亚特·霍尔 …… (66)
约翰·费斯克 …… (93)
戴维·莫利 …… (132)
安吉拉·默克罗比 …… (171)
珍妮特·巴茨丽尔 …… (205)
比尔·施瓦茨 …… (211)
夏洛特·布朗斯顿 …… (215)
理查德·戴尔 …… (221)
吕蓓卡·奥罗克 …… (231)
露茜·布兰德 …… (236)
茉莉·麦克雷尔 …… (238)
佳姬·巴塔恰尔亚 …… (240)
黑兹尔·卡比 …… (246)
麦克尔·丹宁 …… (252)
莉蒂亚·柯蒂 …… (258)
伊恩·钱伯斯 …… (263)
附：伯明翰学派何去何从？ …… (267)
后 记 …… (27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导语:作为文学理论的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之为谓,始自文学理论研究对象外延的扩大。从名称上看,文学理论这门学科似乎从建立之初就有某种扩张的雄心,我国高校过去的课程设置和教材编订就有长期把文学理论的研究视阈与范围"放射"至艺术领域的做法,称之为文艺理论。不仅如此,自前苏联学习来的"文艺学"的概念和说法沿用至今,一直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一门重要的二级学科。英语体系中的 Literary Theory 在这里得到了意义的"延伸"。

有学者认为,文艺学应该包括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文艺史。[①] 但是,文艺理论也好,文艺学也好,实质上是在对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作品概括和提炼的基础上建立的,尽管有时为了"名副其实"也会扯进些艺术实践或艺术作品作例证,试图说明此种理论的普遍性、代表性或典型性。然而,艺术自有其特殊性和自身规律,文学理论的适用性并不能完全涵盖到艺术实践,文学理论之"叙述"对艺术实践和艺术作品并不能完全有效,同一种文学理论甚至连不同类别的文学作品如小说、诗歌、剧本都不能具有普遍适用性,更何况不同的艺术门类如美术、音乐、戏剧均各具特色、各有

① 参见姚文放《现代文艺社会学》,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修订版。

独特性呢？如此，所谓的文艺理论、文艺学就不免遭遇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自圆其说”其名称的需求促使其不得不“光顾”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领域，另一方面对艺术创作又不具有适用性和指导性，更得不到艺术家的认可。

然而，这种窘境并未阻挠文学理论“扩张疆域”的雄心。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种来自内部——文学理论内部出现了危机；另一种来自外部——文学理论外部出现了生机。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文学理论自身出现萎缩，有学者起身对其合法性、合理性与适用性从多方面进行了抨击和解构，[①]并随后从西方文化研究视野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得到启发，结合社会学，把不能成立的“文学理论”进行了文化社会学性质的重建、重构，并沿用西方 Cultural Study 一词，称为“文化研究”。[②] 那么，文化研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还拥有文学理论的成分？在这点上尽管众口不一，有人认为文化研究是文学理论的社会学延伸，即文学社会学或曰文化社会学；有人认为文化研究早已“自立门户”，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在我看来，文学社会学或曰文化社会学之所以能够成立，说明这里的文学与文化可以等同，可以画上等号；而文化研究之“自立门户”并非“另起炉灶”，而是承继了文学研究、文学理论“内功”之后的学科独立。也就是说，文化研究合法性的逻辑基础是“文学”这一概念内涵的扩大，文学的范畴和文学研究的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的范围，而是包罗了一切文化现象，实现了文学向文化的转向，从以往仅针对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的文学研究，扩大至涵盖音乐、绘画、舞蹈等艺术形式，随后又囊括了电视、电影、因特网等大众文化现象的文化研究。

---

① 参见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载《文学评论》2001 年第 5 期。

② 参见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载《文艺研究》2004 年第 1 期。

称作文化研究的文学理论“改头换面”式的重构，具有更为广泛的普遍适用性，不仅消除了过去文艺理论意欲涵盖艺术而不得的尴尬境遇，而且应用于所有文化现象当中仍能有效，因而给内部危机重重的文学理论带来了新的生机。[①] 这是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生命力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伯明翰文化学派最初的创始人都是地地道道的文学理论研究者，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研究者，这些在本书的前几个人物的章节记载得很清楚。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曾繁仁教授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史论》当中对此也有明确叙述。[②] 我在 2003 年对伯明翰学派传人佳姬进行访谈，谈到当代意义的文化研究何以在中国兴盛的时候，佳姬也说，文化研究在 21 世纪中国的兴盛“与文化研究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兴盛几乎是一样的，伯明翰学派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是搞文学出身的，比如它的先驱 Raymond Williams 就可以说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文艺理论学者，不仅著有 *Marxism and Literature*，*Keywords*，*Culture and Society*，*The Long Revolution*，*City and Country*，而且写过剧本。我的本科也是英国语言文学系。正因为文化和文学不应有一个刻板固定统一的模式，所以才会对文本阐释的相异性产生如此广泛的兴趣。媒体的受众更会制造出不同的标准和评价体系……”（见附录《伯明翰学派何去何从？》）从与佳姬的谈话我们也不难看出，文化研究在当代已经成为了一种研究模式，一门学科，是一种文学社会学或文化社会学。

这其中潜在着把文化研究社会学化或把其看作社会学一个分支的危险。其实，文化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然具备自身的

① 参见珍妮特·沃尔芙《文化研究与文化社会学》，载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 4 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参见曾繁仁《新时期文艺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4 月版。

特殊性，它在本质上应属文学研究的范围，是扩大了“文学”之内涵的文学研究，不能隶属于一般社会学而成为其分支之一，“文学并不能代替社会学或政治学。文学有它自己的存在理由和目的”①。反之，本质上属于文学研究的文化研究也不能被社会学或政治学所代替，它更不能成为一般社会学的某种特例、资料，用以阐释和印证一般社会学原理、服务于一般社会学，它是越来越多地转向文化研究的文学理论。在这一当代进程中，不少学者担心这会消解和取代了过去的文学理论，而事实上，当代意义的文化研究的确是作为一种文学理论而成立和被接受的，它的确是一种新型的适应当代文学发展的文学理论。

张　华

2008 年 3 月于北京

① 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112 页。

怀旧与批评：霍加特《识字的用途》

一

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d，1918～)，英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伯明翰学派的主要创建者，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创者之一。

霍加特出生于英格兰北部工业城市利兹(Leeds)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长在查培尔顿(Chapeltown)和汉斯莱特(Hunslet)。据霍加特晚年回忆说，他出生和长大的地方"百分之四十的人失业，百分之四十为单亲家庭，百分之四十靠救济款度日。[①] 这与我们在其早年的著作《识字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中所读到的描述似乎有些难以协调。在他的笔下，他少年时代的故乡的生活丰富多彩，充满情趣。霍加特在家乡读了小学、中学，并以"奖学金学生"的资格在当地接受了大学教育。以优异成绩毕业后，服过几年兵役。1946～1959年，他受聘于赫尔大学(Hull University)成人教育部，担任讲师和研究员，为那些因为经济、个人或阶级原因无法进入正规高等教育的成人讲授文学课程。期间多次以人

① 马克·吉普森、约翰·哈特雷著，胡谱中译：《文化研究四十年》，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5期。

类学者、参与者和观察者的身份回到家乡考察调研，并报道在那里的所见所闻。这极大地影响了霍加特文化观点的形成。他于1957年发表的成名作《识字的用途》就是他十年成人教育的直接成果，此书已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经典，其所采用的著述方式一直被后人认为是"开创了英国文化研究中颇有特色的民族志传统"的范例。

离开赫尔大学后，霍加特到伯明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 ham)英语系担任文学教授，他是这个系自建系以来的第二位教授，第一位是一个莎士比亚研究专家。霍加特以擅长研究大诗人奥登而成为一名奥登专家。然而他的主要成就却不在奥登研究方面，其方法也不符合当时英国文学研究界的所谓学科规范，且超出了文学研究的学科边界。其实，几年前发表的《识字的用途》就是无法归入任何学科的一本奇书。

1960年，企鹅出版社出版了未经删节的企鹅版《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引起轩然大波。1959年英国议会刚刚通过《淫秽出版物法案》，《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被告上法庭，成为此法案的第一个案例。案子审理了一个星期，每日大小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使此案成为英国法律史上最著名的案例之一。许多著名作家站出来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说话，出庭作证的最著名的作家有爱·默·福斯特(E. M. Forster)和霍加特。官司的结果以企鹅《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胜利而告终，于是，在书店中购买此书的人又排起了长队，到1960年底，《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已售出200万本，第二年又卖出130万本，创造了企鹅出版史上的最高纪录，许多人说，在1967年《同性恋法案》等各种变革之前，英国20世纪60年代"宽容的社会"(Permissive Society)早便由《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胜利出版而开始了。企鹅出版社为酬谢霍加特在法庭上的卓越表现，便捐赠了一笔钱给霍加特，四年后这笔钱作为基金被霍加特派上了用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一年，霍加特还参加了“全英教师联盟大会”，会议主题是“大众文化与个人责任”，霍加特和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这次会议最积极的成果是，英国的知识界和教育界似乎已经意识到，大众文化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理应列入主流文化的议事日程。

1964年，霍加特在伯明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创建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e Studies，CCCS)并出任该中心首任主任。在中心成立当天发表了题为《英语学校与当代社会》的就职演说，他说：“在听一个流行音乐节目的时候，很难……不产生一种既被它吸引又对它厌恶的复杂感觉。”[①]对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霍加特依然保持着多年前形成的印象和看法，但此时他更倾向于将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作为严肃性的课题纳入英国学人的研究工作之中，而这在当时确实面临着不少阻力，因为文化研究在那时的英国大学中处境不佳。尽管如此，霍加特还是果断地创建了文化研究中心。他在就职演说中，为研究中心拟就了纲要，把需要探究的问题划分为三类：历史和哲学的、社会学的、文学批评的。关键问题是评估通俗文化的各种形式，判定其在社会中的位置，厘清文化争论的混乱局面。1964年，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第一份报告列出了需要着手研究的首要七个项目：

1. 奥维尔(Orville)和20世纪30年代的气候；
2. 地方报业的成长与变化；
3. 通俗音乐中的民歌和俚语；
4. 当代社会小说的层次及其变迁；

① Richard Hoggart, *“Speaking to Each Other, In second volume” English School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London: Chatto Windus publishing house, 1970, p. 258.

5. 国内艺术及肖像研究；

6. 流行音乐及青春文化；

7. 运动的意志及其表征。

文化研究中心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培养研究生，但他一反传统研究生教育授课、考试、颁发学位的程式，鼓励研究生成立各类研究、读书小组，并在讨论、交流的基础上修改、发表一系列论著。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的时候据说只有两个人，除了霍加特，另外一个是英语文学的研究生、牙买加人斯图亚特·霍尔(S. Hall)。霍尔在成为《新左派评论》的编辑之前做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当然，研究中心不可能始终都是他们两个人，后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生进来，不仅有英国本土的，还有丹麦人、斯堪的那维亚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巴西人，等等，可以说，研究中心雄心勃勃，真正做到了兼收并蓄。

研究中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位新上任的副校长对研究中心很有成见。1968 年，法国爆发的"五月风暴"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受其影响，伯明翰也爆发了学生运动，有近四千人到市府前举行集会，并和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霍加特支持学生的行动，引起那位副校长的强烈不满，多次向霍加特施加政治压力。与此同时，霍加特的地位也因其对大众文化所作的令人沮丧的预测而备受知识界的抵制，有人批评霍加特代表了一种悲观的、茫然的、精英主义的，甚或是更年期的批评。这一年年底，霍加特被迫离开了伯明翰大学，离开了他一手创建起来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1970 年 1 月，霍加特赴巴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理主席，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也就在此时，伯明翰研究中心发生了全面转向，公开发表的著作开始特别关注社会结构的性质以及转变它们的可能性。霍加特注意到了这一转变，他说：中心变得更政治化，也更理论化了。

结束代理主席的使命之后，霍加特回到英国，先是在皮尔金特(Pilkington)广播委员会工作，作为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之一，他批评了ITV的商业主义，推介了BBC2的组建，并且为皮尔金特撰写了大量报道。后来又担任大不列颠艺术委员会(The Art Council)副主任。20世纪70年代后期，霍加特介入了艺术委员会的一场论争，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7.84剧院公司(7.84 Theatre Company)的约翰·麦克格拉斯(John McGrath)希望建一个大众的工人阶级剧场，其目的不仅是为反对国家剧院的戏剧文化，而且是为支持对抗资产阶级社会统治机构整体的反霸权主义斗争。因为经费吃紧，主持艺术委员会的社会民主派着手寻求出路。苏·布拉登(S. Braden)发表著作《艺术家与人民》(*Artists and People*)指责艺术委员会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他说："20世纪最大的欺骗就是向所有人民坚定地宣称这是他们的文化。大不列颠的艺术委员会就是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下的。"[①]艺术委员会的主任罗伊·肖(Roy Shaw)在《卫报》(1978年9月20日)发表评论攻击了布拉登的"庸俗马克思主义"，霍加特则辩称艺术委员会将经费优先开销于"特殊的主要为表演性质的艺术(戏剧、音乐、歌剧、芭蕾)"，而不是将有限的税收浪费在他所贬称的"参与性的、基层群众的、民主和通俗的艺术"，是为了保持像考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的皇家歌剧院这样的剧场票价的低位。在1980年的"艺术的优秀与标准"专题讨论会上，霍加特批评了文化相对主义，特别引布拉登为例，同时也批评了一些学人的"打着文化的旗号访问贫民窟"。显然，霍加特早些年就具有的矛盾性又一次暴露了出来，吉姆·麦克盖根(J. McGuigan)正确地指出："霍加特明显的前后矛盾拉远了他与广涉阶级、性与种族等问题的文化民主运

① Braden, S., *Artists and People*, London: Routledge, 1978, p. 153.

动——一种比他所曾表明的纯粹得多的民粹主义。”[①]

二

作为伯明翰学派的开山之作,《识字的用途》一书奠定了霍加特在英国文化研究中的先驱者地位。此书“一反当时的文化争论总是围绕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区别进行的模式,转而集中解读了工人阶级文化的价值与意义”[②]。霍加特之所以要撰写这样一部著作,与他本人对当时在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利维斯派(“细绎”集团)的政治保守主义和精英主义立场反感有关,虽然他本人经受过严格的利维斯式文学批评的训练。当然,也与二战后工人阶级自身所发生的变以及此变化在新旧左派阵营引起的论争有关。在战前,英国的工人阶级失业严重,而战后则就业充分,随着福利制度的建立,白领与蓝领之间的差别正在缩小,于是,知识界开始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工人阶级正在逐渐中产阶级化,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正在消失。但是以威廉斯、汤普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左派并不接受这种看法,他们力图重新确认工人阶级的政治与文化身份,霍加特的著作可以看作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随着电视的普及,美国大众文化进入英国以后对工人阶级传统文化产生了腐蚀破坏作用,这引起了霍加特基于本能的警觉和忧虑。因此,《识字的用途》又是一种对变化的回应。

但在当初,这部著作似乎并不受欢迎。霍加特后来回忆说:“我所遇到的英文系的许多老师对此书保持沉默,好像议政厅的边

---

① 吉姆·麦克盖根著,桂万先译:《文化民粹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3~64 页。

②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Ed by Jessca Munns and Gita Raj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p. 196.

门跑出一只讨厌的老鼠带入了奇怪难闻的东西。”[①]而社会学家则认为它不法地闯入了自己的跑马场，对其极为个人化的自传式写法深不以为然。

《识字的用途》确实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在第一部分“‘旧式’的秩序”(an‘older’order)中，霍加特充分利用了他童年时代的经验和记忆，生动、逼真地展现了二战前那个时期工人阶级社区的生活、文化氛围，详尽地描写了工人阶级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工人们经常光顾的小酒馆、工人俱乐部，有声有色的街道、流行小铺(诸如 Wooley，Woolworth 都是工人阶级大众的所爱)、大小市场、电车站，以及工人们的体育活动、语言习惯、私生活、家庭和性别关系，工人中流行的报纸、杂志及上面刊载的各种故事等等。这些属于记忆中的东西与二战后受美国式大众娱乐文化影响的生活与文化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霍加特的记忆中，他童年时代的工人阶级大众也有一个类似于中产阶级的属于自己的城市中心，人人各有所属，各取所需，贫富差距、文化差异和社会矛盾都不是非常明显。从居民的地域同一(Territorial identity，即对于地域内部的众人来说，这是一个小世界，像一个村庄，他们聚落而居，仿佛部落区)、社会同一性(Social identity，即居民们相信他们处于相同水平的物质和社会地位，分享共同的经验和共同的回忆)、社区居住的连续性(即居民较长期稳定地居处于一个社区而形成社区内社会关系网络的连续性)三个方面考察，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工人阶级社区更类似于传统邻里社区，可以说是一个充满和谐的有机社会，这种和谐性与有机性一定程度上冲淡并缓解了贫穷带给人们的压力与烦恼。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们缺乏明晰的阶级意识，事实上，他们仍会按照传统

① Richard Hoggart, *A Sort of Clowning*, *Life and Times*, 1940－1959,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90, p. 147.

区分“我们”和“他们”：“他们”是雇主、文职公务员、地方当局、教师、在校学生、地方行政官等，“他们”高高在上，制定法律，发号施令，而“我们”则处于不利的地位，干“他们”要“我们”干的事，遵循“他们”为“我们”设定的限制和法律。应当看到，这种区分有助于促成工人阶级构建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美学与公共文化。

霍加特认为，20 世纪 30 年代的英国工人阶级拥有自己的美学和文化。这种美学追求一种“展示”或“表现”，而不是“钻研”或“探索”，它起始于这样一个假定，人类生活本身是引人入胜的，人类日常生活的细节足以使人产生无以复加的兴趣。当然，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指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不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只占人类的一小部分，而“我们”却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庞大的群体把注意力集中在当地和个人的事务上，他们不会去思考抽象的形而上学，诸如“文化”定义一类的问题，但不容置疑的是他们拥有自己的文化。霍加特根据自己的体验与观察，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即文化是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和把握，是大多数人的事情。在论及英国广播公司的带有中产阶级背景的广播连续剧能在工人阶级中间流行开来这一现象时，霍加特分析说，这并非因为工人阶级趋炎附势，而是“因为这些连续剧每天反映的是日常生活的细节”，只是“把人表现为人”，只要广播节目“是真正家常的、普通的，它就会使受众兴趣盎然，乐此不疲”。一些报纸、杂志、廉价小丛书上登载的通俗故事同样令人喜爱，因为它们忠实地记录了普通生活中有趣的或令人担心的琐碎事件，并且非同寻常地忠实于大多数读者生活的细节。霍加特高度评价说：“这些故事描写的是一个有限的纯朴的世界，以几种公认并信奉已久的价值为基础，它往往是一个幼稚而华美的世界，感情的迸发形成巨大的热情，但这些感情迸发的确在起作用，这不是一个腐败或虚伪的世界。”就其本质而言，这些通俗故事“不是鼓励人们去逃避日常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